

编者按

当世界文明对话的声浪回响在朱子故里,我们凝视的不仅是思想的星河,还有承载思想远航的“舟楫”——建本。朱子曾描述:“建阳版本图书,上自六经,下至训传,行四方者,无远不至。”这一张张自闽北山林走向四方的书页,曾是朱子著述传扬的载体,也是宋代以来全球文明交流的“先驱”。从儒家典籍到通俗小说,从科举范文到医书方志……建本“活力满满”,将知识送至庙堂,送入寻常巷陌,甚至传播到日本、朝鲜、东南亚及欧美等世界多地。今日我们重访建本,不仅为了怀古,也为了乘上文明互鉴的“舟楫”,在知识流动的“洋流”中,驶向经典的深奥处。

千年建本里,老祖宗们读啥?

□张辰辰 文/摄

考公大纲

明嘉靖版的《建阳县志》称:“书市在崇化里,比屋皆鬻书籍,天下客商贩者如织,每月以一、六日集。”朱熹弟子祝穆曾编写《方輿胜览》一书,其中介绍建宁府土产时,把“书籍行四方”列在“贡龙凤等茶”“兔毫盏”之前。可见在祝穆眼中,建本比贡茶、建盏更能代表建宁府。

祝穆是爱书之人,晚年又卜居于建阳麻沙,对于书籍和麻沙的偏爱或许令他对建阳的土产评价偏颇。但建阳书坊也是全国闻名,甚至吸引了孔子后人。明朝泰昌元年(1620)的官修图书《礼部志稿》记载:“宣德四年,袭封衍圣公孔彦缙,欲遣人以钞往福建市书,虑远行不敢擅,咨于尚书胡濙。”山东曲阜是孔子故里,也是文教昌明之地。即使是孔子后裔也舍近求远,从山东派人到福建购书,可见建本驰名全国。尚书胡濙将这个购书的请求传达给皇帝,得到了朱瞻基的批准:“买书这种事还打什么报告呢?”即“上曰:福建鬻书籍无禁,先圣子孙欲广购,亦何必言?”

建阳书坊与明朝官方打交道不仅这一次,由于书坊影响力大,朝廷想要刊发“考公大纲”也需借助书坊的力量。《解学士文集》中有《献太平十策》一篇,其中解缙就向皇帝朱元璋建议:“一宜令天下投进诗书著述,官为刊行。令福建各处书坊,今国学见在书板,文渊阁见在书籍,参考有无,尽行刊完。”

《礼部志稿》还记载:“嘉靖五年(1526)时,福建建阳县书坊刊刻浸盛,字多讹谬,为学者病。于是巡按御史杨瑞、提调学校副使邵统疏请,专设官第于翰林院春坊中,遣一人往。寻遣侍读汪佃行诏,较毕还京,勿复差官更代。”建阳书坊刊刻错别字太多,甚至有翰林院下派专员到建阳校对。

孔子后裔买书想必离不开儒家经典,不过建阳书坊自五代兴起,直到清朝沉寂。其间刊书数千版本,除了经史子集以外,还有哪些种类呢?

通俗小说

建本价格低廉,发行广泛,恰好迎合了“下沉市场”的需求。与志在蟾宫折桂的科举士子不同,小说的受众多为有识字能力的普通百姓。在这部分受众眼中,“圣贤之书”深奥晦涩,并非他们所青睐,充满幻想色彩的神魔小说才对“胃口”。

明代小说的“顶流”必然是《西游记》,许多书坊主或作者敏锐地看见神魔小说具有广大受众这一商机,立刻模仿《西游记》,写出同类型的小说《东游记》《北游记》《南游记》。这四本被人汇集在一起,捆绑销售称为《四游记》。

其中《北方真武玄上帝出身志传》(《北游记》)和《五显灵光大帝华光天王传》(《南游记》)的作者为余象斗,是建阳人。叶德辉在《书林清话》中曾言:“夫刻书之盛,首推闽中,而闽中又以建安为盛,建安尤以余氏为最。”余象斗正出身于这样一个以刻书为业的世家。据记载,他早年也曾读书求仕,但屡试不第。万历十九年(1591),余象斗彻底放弃科举,“辛卯之秋,不佞斗始辍儒家业,家世书坊,侵笈为事”,自此专心经营印刷出版业。

这些建本小说也常被人诟病。明人胡应麟对此批评道:“余二十年前,所见《水浒传》本,尚极足寻味。十数载来,为闽中坊贾刊落,止录事实,中间游词余韵,神情寄慨处,一概删之,遂几不堪覆瓿。”从胡应麟的这番话可见,建阳书坊为了节省成本,删减了大量原著中值得细品的细节描写,只保留大体的故事框架。不过,正是这些粗陋的“简本”,拉低了书本价格,让小说更易流通。到了清末民国,鲁迅也成为《四游记》的读者。



余象斗《北游记》(资料图片)

社交宝典

宋朝重文抑武,真宗赵恒亲作劝学诗“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”规劝士子读书。随着政策推行,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得到提升,普通民众的文化需求也相应增长。

宋代上层士人日常交际流行递送启札。这种社会风潮也影响到了普通市民群体,平民百姓的冠婚丧祭也需要书写各类启札。相比科举选拔的文化精英,普通百姓对于历代掌故不甚了解,文墨功夫难免欠缺。启札内容“无非应酬泛语”,只要了解掌故,参考名人启札,粗通文墨者亦可速成。于是就有编书人将启札常用的典故以及诗词搜集整理,编纂成书。《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》这本社交宝典便应运而生。该书“凡古今前辈之事实,近日名公之启札,皆网罗而得之”,即将典故和范文一网打尽,书名中的“截江网”也由此而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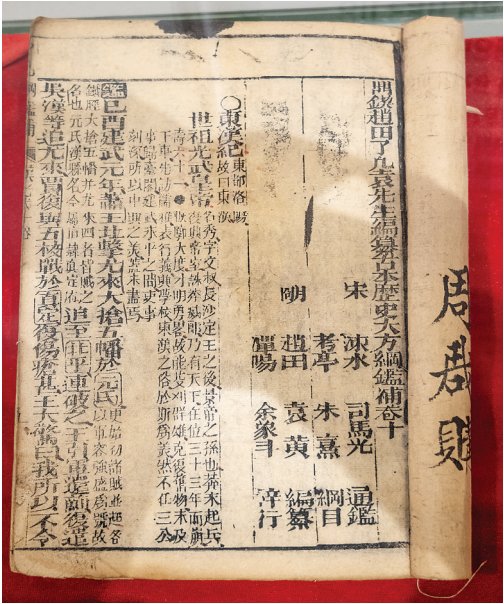
这类社交宝典实用性强,建阳书商自然不会忽视。在《南宋楼藏书志》中,作者陆心源记录了他收藏一部“四库未收,各家书目皆未著录”的《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》。陆心源通过此书“多载宋人文集全篇之不传者”这一信息得出结论,“案此宋麻沙本……盖宋季刊本也。”

国家图书馆现藏有元刊本《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》,书中将“谢惠诗词”“事实”分门别类,其中诗词部分标注“自寿”“寿丈人”“夫妻寿”等排列整齐,古人使用时寻章摘句便可速成一篇启札。

押题教辅

高考是莘莘学子的人生大事,科举在古代更是士子们穷尽毕生的目标。科举八股文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士子的命运。于是,一类名为“举业书”的押题教辅也成为书坊书商刊刻的热门项目。

根据《七修类稿》所述,这类“押题教辅”最早诞生于明朝成化年间,时任杭州通判的沈澄收集“时文”,“刊《京华日抄》一册,甚获重利”。见有重利可图,书坊自然趋之若鹜,商业嗅觉灵敏的建阳书商立刻效仿,甚至更进一步“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”,就连“名师真题”也刊印在内。



《历史大方网鉴补》建本

举业书流行得特别迅速。明代人李诩在《戒庵老人漫笔》中回忆:“余少时未见有房稿刻本……今则满目皆坊刻矣。”李诩出生于正德元年(1506),写作《戒庵老人漫笔》时已经处于万历年间,可见押题教辅这类书籍仅仅数十年就风靡社会。与李诩生活同时代的李濂也说:“比岁以来,书坊非举业不刊,市肆非举业不售,士子非举业不览。”可见当时押题教辅几乎彻底占领市场。

由于科举在读书人心里的神圣性,虽然民间热衷购买《京华日抄》等押题教辅,但是官方却视为投机取巧之物,严令禁止。印刷中心建阳自然成为众矢之的,弘治十二年(1500),孔庙和建阳麻沙书坊接连失火。吏科给事中许天锡借用“成周宣榑火,春秋书之”的典故,将火灾归咎于书坊,认为当下风气“俗士陋儒,妄相裒集,巧立名目,殆其百家。梓者以易售而图利,读者觊侥幸而决科,由是废精思实体之功,罢师友讨论之会,损德荡心,蠹文害道。”提出有关部门应该派遣有学识的官员前去建阳考较刻板。“其余晚宋文字及《京华日抄》《论范》《论草》《策略》《策海》《文衡》《文陆》《主意》《讲章》之类,凡得于煨烬之余,悉皆断绝根本,不许似前混杂刊行。”

尽管借着天谴的理由,明朝官方对建阳书坊刊刻的举业书板进行了整顿,把《京华日抄》在内的众多“押题教辅”的刻本都销毁了。奈何书商以此牟利,士子借此参考,经过多年的“用户培养”,这类书籍已经是供销两旺的“市场刚需”了。此次整顿的87年后,即万历十五年(1587),礼部便上疏:“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,其后举业流弊安穷,弘治、正德、嘉靖初年,中式文字纯正典雅。宜选其尤者,刊布学官,俾知趋向。”可见押题教辅并没有因为刻板被销毁而灭绝。礼部有鉴于民间押题教辅没有官方指导,引用的出处五花八门,甚至有将佛经、道藏内容写进考卷。礼部迫于无奈,只能“打不过就加入”,刊发了官方编写的押题教辅。

名人故事

宋代书坊刊刻火热,在建阳讲学的朱熹也必然接触到书坊。不仅如此,朱熹还亲自编书指导刻书。除了《论孟精义》这种儒家经典以外。朱熹还整理了北宋太祖、太宗、仁宗、真宗、英宗一共五朝大臣的言行事迹,编纂为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。朱熹希望通过名人故事教化百姓,他在中自序:“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,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,多有补于世教……于是掇取其要,聚为此录,以便记览。”朱熹后来又编纂了一本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记录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三朝名臣事迹,两本合称《八朝名臣言行录》或《宋名臣言行录》。朱熹将北宋名臣的事迹中可信的部分保留下来,书中没有个人的评论希望以此作为后世君臣的借鉴。

朱熹在自序中谦虚地提到“尚恨书籍不备,多所遗阙,嗣有所得,当续书之”。该书一经刊刻就被朱熹朋友吕祖谦注意到。吕祖谦看到该书后,就在给朱熹的信中(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中《与朱元晦》),问朱熹:“近麻沙印一书,曰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,板样颇与《精义》相似,或传吾友所编订,果否?盖其间颇多合考订商量处。若信然,则续次往求教。或出于它人则杂录行于世者,固多有所不暇辨也。”吕祖谦读过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后,认为其间有许多地方还值得商榷,希望能和朱熹商讨。由于朱熹没有回信,吕祖谦还写信给另一儒家学者汪应辰求证这件事(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中《与汪端明》):“近建宁刊一书,名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,云是朱元晦所编,其间当考订处颇多,近亦往问元晦,未报,不知尝过目否?”

吕祖谦分别在两信,皆提及朱熹刊印此书于建阳麻沙。朱熹后来回复吕祖谦时,谦虚地表示书籍编写时太过匆忙:“《言行》二书,亦当时草草为之,其间自知尚多谬误,编次亦无法,初不成文字。因看得为订正,示及为幸。”从回信中可知,仅仅在朱熹和吕祖谦两人往来一封信的时间,“一书”就已经成为“二书”,不得不感叹建阳书坊刻书的效率之高。

由于朱熹编《八朝名臣言行录》引用了司马光撰写的《涑水记闻》。其中有记载吕夷简劝仁宗废郭后的事迹。吕家后人不想祖先“黑历史”传播,宣称《涑水记闻》不是司马光写的,记录自然也不可信。朱熹虽然在信件里表示会订正,但忍不住“吐槽”:“某尝见范太史之孙某说,亲收得温公手写藁本,安得为非温公书!某编《八朝言行录》,吕伯恭兄弟亦来辨。为子孙者只得分雪,然必欲天下之人从己,则不能也。”

减刑凭证

除去以上有记录或存世的建本书籍、雕版以外。仍有一些书籍可以推测存在建本版本。例如,古人阅读的建本书籍里甚至可能还会有“减刑凭证”。这种“减刑凭证”可不是王朝开创功臣才有的丹书铁券。而是朱元璋颁布命令,每户须持有一本的《大浩》。《大浩》的印刷量相当庞大,其中也必然有建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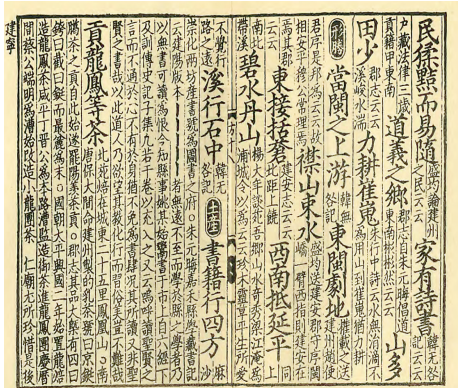
洪武十八年(1385)朱元璋编定《大浩》:“朕出是浩,昭示祸福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,户户有此一纸,若犯笞杖徒流罪名,每减一等,无者每加一等。所在臣民,熟观为戒。”换句话说,《大浩》是皇帝指定的一种官方减刑凭证。虽然难以查究这项政令是否真的推行,不过,了解到建本里居然有如此“硬核”的读物,是否也令读者朋友意外?



清道光三十五年刻板(图片经镜像翻转)

地理百科全书

祝穆,字和甫,是福建崇安(今武夷山)人。他既是朱熹的表侄也曾受业于朱熹。他在书斋里谈经论道之外,也经常出游,搜访各地风物。后来,他耗时十几年,编写出《方輿胜览》一书。这部著作不只是简单地记录疆域、郡县、形胜,更把风俗、土产、山水、名贤、题咏也囊括在内,是当时的一部地理百科全书。而且本书奇妙在于,《方輿胜览》是在建阳刻成雕版。所以《方輿胜览》这本书既是建本,书中“建宁府土产”的内容又介绍建本,这种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的情形,想来别有趣味。



《方輿胜览》建宁府土产(资料图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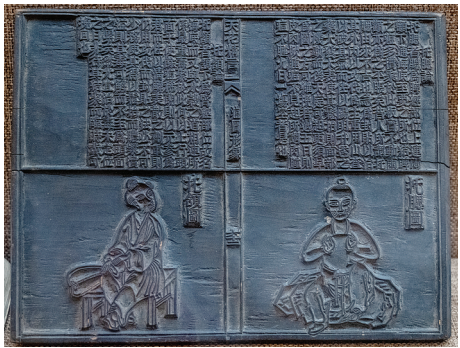
植物百科全书

书名《全芳备祖》中“全芳”指全书辑录花、果、草、木等植物种类完备,“备祖”则取自考辨源流必稽其始的编纂体例。

尽管学界对于此刻本诞生于宋朝或元朝尚有分歧。不过,该刻本与宋末同类建本的版式、字体如出一辙,使用的俗体字、简化字也大体相同,该刻本属于建本为学界共识。

治病养生

据明嘉靖版《建阳县志》记载:“熊宗立通阴阳医卜之术,注解《天玄》《雪心》二赋。《金精难经》《脉经》《药性赋》《补遗》及《妇人良方》等书行于世。”从书名中便可以看出,熊宗立编辑出版的书都是医书。



《天花精言》刻板(图片经镜像翻转)

在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还记载:“元瑞州路医学教授胡仕可,取本草药性图形作歌,以便童蒙者。我明刘纯、熊宗立、傅滋辈,皆有歌括及药性赋,以授初学记诵。”

到了清代,我国天花治疗的预防理论与实践技术有了极大进步,有关天花的医学著作大量涌现。清中叶袁句的《天花精言》是第一部出现“天花”一词的一书。

